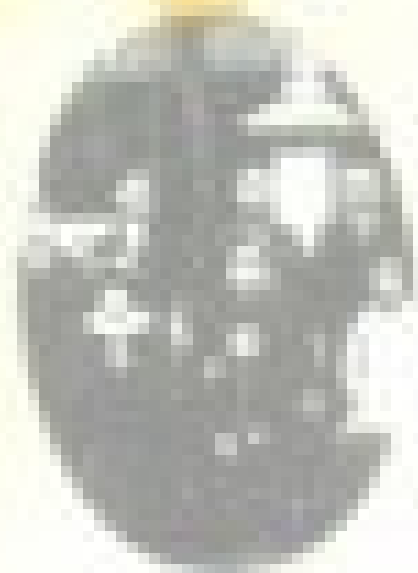


民國掌故



杨天石 主编
民国掌故

天 國 的 童 話



天國
的
童
話

掌故民國

楊天石 主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民国掌故

杨天石 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75 印张 2 插页 267 千字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定价：11.30 元

ISBN 7-5006-1287-7/K·198

06743

序 言

我常想，散文有小品，戏剧有小品，史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小品？散文小品，例如鲁迅的杂文，可以进入最辉煌的艺术殿堂，史学小品就一定只能排斥于科学之宫的门外？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作用。崇楼杰阁，固然巍峨壮丽；一亭一台，亦复自有其风流。史学需要万字、数万字、数十万字以至数百万字的宏篇巨制，但是，如果有一种体裁，能够在不长的篇幅内提出并解决一个问题，说明一个观点，提供一点有益的知识或启示，而读者读起来又有点兴味，不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吗？中国诗歌能在几十个字之内创造出引之愈深，探之弥永的意境；中国绘画能在尺幅之内见万里之遥；史学小品也完全可以小中见大，写出论证严谨、思想深刻而又清新可读的篇章来。

我曾经谈到过：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的历史经验，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分析齐、楚、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文五百四十余字。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释《元史》中的“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DL65/08

《宋论》是有名的史论集，其中的篇章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古人能做到的，何以今人就做不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恐怕写短文尤有其必要。

感谢《团结报》概允开辟《民国史谈》专栏，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试验园地。三年多来，我们在这块园地上共发表了三百余篇文章，现从其中选出一百余篇，编为《民国掌故》一书，奉献给读者。

当《民国史谈》开创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开场白》，中云：

民国史正在成为热门学问，研究室、研究会一类的机构陆续建立，专业杂志、丛书、专著、资料、多卷本的煌煌巨著正在不断出现。本报不揣谫陋，也想凑凑热闹，因有《民国史谈》专栏之设。凡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物、党派、团体、社会、民族、风俗诸项目，均可入“谈”。每篇字数希望在一两千字之间，或介绍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或阐述新见解，体裁、风格不拘，叙事、议论、考证均可。总之，不炒冷饭，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娓娓谈来，专家、学者不厌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可以收长知识、明往昔、助研究、怡神志之效。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本报同人尚无把握，只能悬鹄自励，做起来看。

现在，我们原定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只好请读者评判了。

承各位作者惠赐鸿文，原《团结报》总编辑王琦、专刊部主任全灵、编辑刘晓林诸同志大力支持，1990年我访美之际，朱宗震同志代我主持编务达半年之久，现又承中国青年出版社支持本书的出版，谨志谢忱。

杨天石

1991年7月1日

目 录

香港当局驱逐孙中山一案的记载	刘蜀永 (1)
邹容自贬《革命军》	杨天石 (4)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杨天石 (7)
清政府乞求日本驱逐孙中山	杨天石 (10)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杨天石 (13)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杨天石 (17)
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杨天石 (20)
何天炯谈“三·二九”起义	杨天石 (23)
黄兴与中华民族大同会	陈长河 (26)
民初广东军政府的禁烟禁赌斗争	周兴梁 (29)
民初广东革命家解放妇女的种种努力	周兴梁 (33)
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杨天石 (36)
戴季陶的文字狱	朱宗震 (40)
陆征祥演说失败与组阁危机	朱宗震 (44)
宋案侦破的经过及意义	周兴梁 (47)
辛亥革命后的客籍军队	朱宗震 (50)
袁世凯政府指望的中日“互助”	杨天石 (53)

民三内国公债的发行	朱宗震 (56)
评黄兴的“缓进论”	朱宗震 (59)
1915年的储金救国运动	尹俊春 (62)
袁世凯伪造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杨天石 (65)
云南反对帝制的首通电报	曾业英 (68)
孙黄重新合作的代价	朱宗震 (72)
陈其美之死	朱宗震 (75)
洪述祖临终遗言	朱宗震 (78)
顾维钧争国权舌战牧野伸显	牛大勇 (80)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	陈漱渝 (84)
段祺瑞对日《秘密意见书》	杨天石 (89)
蔡元培请孙中山下野的一段史事	张学继 (93)
美国在关余问题上的态度	陶文钊 (97)
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四项提案	杨天石 (100)
为中国革命捐躯的苏联英烈——巴甫洛夫将军	周兴梁 (103)
溥仪出官、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杨天石 (106)
熊克武的被拘与释放	周兴梁 (110)
“三·一八”惨案与国民军	丘权政 (114)
“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的国民党员	王善中 (118)
英国是怎样策划武力压制省港大罢工的	牛大勇 (120)
英舰强泊西堤与省港大罢工之收束	牛大勇 (123)
军警索贿与杜锡珪内阁的垮台	习五一 (126)
孙传芳争废中比条约	习五一 (128)
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	杨天石 (130)
北伐中蒋介石负伤身死的风传	杨天石 (133)
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	杨天石 (136)

孙传芳为何向奉系乞降	习五一 (140)
陈友仁与蓝普森的汉口会谈	牛大勇 (143)
英国弃守汉得租界的原因	牛大勇 (146)
北伐时期的迁都之争与宋子文	杨天石 (150)
顾维钧罢免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	习五一 (154)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电报战”	习五一 (157)
张学良率军三渡黄河	习五一 (160)
张学良亲挽敌将	习五一 (162)
1927 年南京事件之谜	牛大勇 (164)
1927 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杨天石 (168)
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杨天石 (172)
张作霖的“四民主义”	习五一 (176)
张作霖自称“中山老友”	习五一 (179)
张宗昌的“四维主义”	习五一 (182)
冯玉祥为何一度“清共”	丘权政 (185)
“分共”会议上的于右任与彭泽民	杨天石 (189)
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	杨天石 (192)
日本东方会议与对奉强硬交涉	习五一 (194)
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	杨天石 (197)
王天培死因之谜	张学继 (200)
桂系逼宫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张学继 (204)
吴稚晖与汪精卫的一场笔战	张学继 (208)
南京“一一·二二”惨案风波	张学继 (211)
蒋介石再逼中国银行	杨天石 (214)
张作霖的对日“蘑菇”术	习五一 (217)
日本与奉系军阀矛盾激化的经济根源	习五一 (221)

蒋介石北伐京津的密谋	习五一 (223)
皇姑屯谋杀张作霖案的幕后	习五一 (227)
蒋冯阎李四巨头祭告中山之陵	张学继 (230)
1928 年的建都之争	张学继 (233)
邓演达被捕实情	陈漱渝 (236)
马君武与张学良的一桩公案	张学继 (239)
“一·二八”抗战中的宋庆龄	唐宝林 (243)
丁文江关于停止剿共准备抗日的主张	朱宗震 (246)
史良竭力营救邓中夏	周天度 (250)
1. 巧妙的讽谏——读蔡元培佚稿《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	陈漱渝 (253)
宋庆龄和鲁迅为什么谴责“福建事变”	陈漱渝 (256)
陈济棠“外打内通”，给中央红军借路	周兴梁 (260)
董健吾张子华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汪朝光 (264)
“九·一八”事变后的王造时	周天度 (267)
沙千里和蚁社	周天度 (271)
沈钧儒与三十年代冤狱赔偿运动	周天度 (275)
邹韬奋和《大众生活》	周天度 (279)
章乃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周天度 (283)
铁骨铮铮的李公朴	周天度 (286)
1936 年的国共上海——南京谈判	汪朝光 (290)
蒋百里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继 (293)
西安事变和“七君子”案的一则史料	周天度 (296)
“七七”事变为什么发生在卢沟桥	郭 雄 (300)
陈仪的疏通与郭沫若回国	陈正卿 (303)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略地位	朱宗震 (306)

国共合作的平型关之战·····	朱宗震(310)
日本为何对华采取战而不宣方针·····	郭 雄(314)
近卫文磨的“最后通牒”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郭 雄(317)
关于台儿庄之战的评价·····	朱宗震(320)
日本的对华侵略总机关——兴亚院·····	郭 雄(323)
日本侵华时期的“桐工作”·····	杨天石(326)
抗战期间军队的经商风·····	朱宗震(330)
中国抗战与外国军火·····	汪朝光(333)
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引起的风波·····	耿云志(336)
冯玉祥、徐树铮公案的最后一场风波·····	陈正卿(339)
接受台湾前后·····	汪朝光(342)
黄河归故道之争·····	汪朝光(345)
1946年初四平街攻防战的政治意义·····	朱宗震(349)
蒋介石的呆笨军事指挥·····	朱宗震(353)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的对策·····	朱宗震(357)
1947年的黄金风潮·····	汪朝光(361)
蒋介石为官僚资本辩护·····	朱宗震(365)
淮海之战黄维陷围时的形势和指挥问题·····	朱宗震(369)
司徒雷登谋求与中共对话·····	牛大勇(373)
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	牛大勇(376)
当年美国分离台湾的密谋·····	汪朝光(379)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由阴历改为阳历的经过·····	周兴梁(382)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始末·····	郭 雄(385)
《扫荡报》的兴衰起落·····	汪朝光(388)

“机械化”部队的由来·····	汪朝光(391)
青年军始末·····	汪朝光(393)
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	杨天石(396)
陈范与《红楼梦》研究·····	杨天石(399)
廖仲恺的富国裕民经济建设思想·····	周兴梁(402)
闻一多与“南海之神”·····	闻黎明 侯菊坤(405)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陈漱渝(408)
徐志摩空难事件·····	陈漱渝(412)
徐志摩死因补叙·····	陈漱渝(416)
张闻天·鲁迅·胡秋原	
——左联时期围绕“文艺自由”问题的一场论辩·····	陈漱渝(420)
杨荫榆是怎样的人·····	陈漱渝(425)
陈西滢与现代评论派·····	陈漱渝(429)
漫议林语堂·····	陈漱渝(432)
章士钊面面观·····	陈漱渝(435)
我也来谈梁实秋·····	陈漱渝(439)
胡适的情感世界(上)·····	陈漱渝(443)
胡适的情感世界(下)·····	陈漱渝(446)
六十年前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上)·····	陈漱渝(449)
六十年前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中)·····	陈漱渝(452)
六十年前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下)·····	陈漱渝(455)
附录：民国史大事简表·····	张学继(458)

香港当局驱逐孙中山一案的记载

刘蜀永

1895年10月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清朝广东当局对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下了通缉令。香港英国当局也于1896年3月4日向孙中山发出“解票”（即驱逐令），宣称“孙逸仙危及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按照1885年第4条则例，即更改1882年充军及原情省赦则例第3款”，将其押解出境，“自给票日起计，以5年为期，不准在本港及所属地方驻留”（英国殖民部档C. O. 129/283，第138—139页）。

香港当局发出解票时，孙中山已流亡国外。大约在1897年8、9月间，孙中山曾写信给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过此事，信件全文如下：

亲爱的骆克先生：

据某些可靠消息说，由于我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香港政府已宣布将我驱逐出境。我询问过伦敦的英国朋友，情况是否属实。他们认为如此处理并不符合英国法律和惯例。但我在香港的中国朋友对此问题给予肯定答复。请先生告诉我，此事是否属实。果真如此，我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

永远忠实于您的孙逸仙（签名）于日本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同前引档案，第136页，原件为英文）

1897年10月4日骆克复信说：

先生：

顷接未注明日期之来函，兹奉命函复先生如下：本政府不愿容许任何人将英属香港殖民地作为避难所，阴谋策划危害一个友好邻国的行动。鉴于先生参加来函婉转称之为“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的这类行动，如果你对1896年的驱逐令置之不顾，足履本殖民地，定会将你加以逮捕。谨此奉复。

辅政司 骆克

（同前引档案，第137页）

当时，香港报纸曾发表评论，批评香港政府对此事处置不当。英国国内也有人对孙中山表示同情。议员达维特曾多次向殖民大臣张伯伦提出质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国政府曾否请求香港总督将孙逸仙驱逐出境？若有此事，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呈报过殖民部？如果这位中国改革家在英属领土未曾触犯英国法律，能否撤回该驱逐令？”张伯伦答复说：“（此事）依据之理由在于当地总督及行政局认为该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中国政府未曾请求进行驱逐，且该人在驱逐令颁发之前业已离港。然而，该人卷入阴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已无疑义。这使其不宜在香港寄迹，目前仍然如此。本人以为对暂行禁止该人在香港居留一事，并无理由加以干预。”（英国殖民部档案C.O.129/286，第337—338页）

清朝政府对此事也相当重视。早在1898年4月21日，听到英国下院有人对驱逐孙中山一事提出质询的消息后，驻英公使罗丰禄急忙拜会英国外交部官员，表示希望该驱逐令保持有效。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允许孙中山返回香港，该人就会在广

州制造动乱(英国殖民部档案C. O. 129/287,第59页)。7月25日,英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英使馆,宣称并未收到过撤销该驱逐令的正式请求。此前不久,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刚刚签订,英国政府拒绝撤销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大约是对清朝政府同意租让新界大片土地的一种“回报”吧。清朝官员对此感激涕零。8月10日,罗丰禄致函英国外交部,深切感谢英国政府再次证明其对中国的“好意”(同前引档案,第313页)。由于英国当局与清朝政府串通一气,拒绝取消驱逐令,1900年孙中山几次乘船来到香港,但从未登岸,只能在船上向革命党人布置工作。

邹容自贬《革命军》

杨天石

邹容的《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情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对它，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旧金山一次就印了11000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20余次，总印数在100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

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较之《革命军》所单纯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思想，自然又前进了一步。